



侗族 艺术 探索

张勇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侗族 艺术 探索

张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侗族艺苑探寻/张勇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12-1756-2

I. ①侗… II. ①张… III. ①侗族—民族音乐—研
究—中国 IV. ①J607.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574 号

书 名	侗族艺苑探寻
作 者	张 勇
责任编辑	杨成星
封面设计	王 佼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 版 地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创兴彩印厂
开 本	787×1 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12-1756-2
定 价	36.00 元



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合影，1989年于昆明。



与贵州省文联主席蹇先艾交谈，后排龙光沛（中）、岳德彬（右）。



与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侗族老领导梁旺贵交谈，
2008年与贵阳。



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侗族老领导莫虚光合影，
1989年于榕江。



与全国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王立平合影，2003年于榕江。



与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长李超（左）、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司殷海山副司长（右）交谈，1984年于昆明。



与戏剧理论家曲六乙（中）、黔东南州文化局副局长李瑞岐（左）在榕江合影。



与在京同胞合影。前排杨权（左一）、杨志一（左二）、郑国乔（右二）、栗周熊（右一），后排杨进铨（左二）、邓敏文（右二）、杨玉梅（右一）。



作者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侗族画家杨长槐（中）、榕江县人大副主任文艳琴（左一）、作者和金蝉小歌手在一起。



与壮族音乐家雅文合影。



与导师敖克成（左二）、学长王运鸿（右二）、陈学祯（左一）合影。



与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吉志义博士（左一）及侗族学者吴仡新（中）聚会。



与澳大利亚博士生英倩蕾（右）、侗族教师罗岚（左）合影。



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杨晓合影。



与从江侗族歌师在一起，梁普安（中）、吴生贤（左一）、吴德光（左二）、吴仁和（右一）。



与侗族歌师吴定邦在一起。



与榕江金蝉小歌手在一起。



与黎平岩洞小歌手在一起。



向芦笙手请教。



青年时代。

愿做山乡画眉鸟(代序)

没有高山,没有丛林,就没有画眉鸟。画眉鸟离不开高山,离不开丛林,我就是这样一只迷恋侗家山乡的画眉鸟。

榕江县三宝侗乡是我的家乡,榕江县文化馆是我的工作单位,群众文化是我的专业,研究侗族文化是我的爱好。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本单位同志们的支持下,在侗乡歌师歌手们的帮助下,近十多年来我整理改编的侗戏《丁郎龙女》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演出奖和创作奖,编曲配歌的侗族童声大歌《小山羊》和《探外婆》获中国少儿歌舞会演创作二等奖,论文《浅谈侗族曲艺》获全国民族文学研究评奖优秀论文奖,还有一些作品获省、州级奖励。1988年以来,我还先后被评为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省卷)编纂先进工作者、贵州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黔东南州首届科技拔尖人才,并成为黔东南州第二届“科技兴州”奖获得者、享受贵州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作为一名基层的群众文化工作者,我连续获得几个全国奖,人们认为我一定从小就受到侗族文艺的熏陶。老实说,我虽然出生在榕江县三宝侗乡,但不敢说,也不能说从小就受到侗族文艺的熏陶。因为我十一二岁就进城读书,初中毕业后考取都匀师范,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县当中小学教员,1962年调回家乡时,我已是20多岁的大后生了。可以说,那时我连一句侗歌也不会唱,所以怎么敢冒充从小就受到侗族文艺的熏陶呢?

同时,我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从小就爱上文艺。我与文艺结缘,是从学拉二胡开始的。1955年我考取都匀师范,那时交通没有像现在这样便利,我们从榕江过三都绕丹寨到都匀,每天走90华里,五天才到学校。因路途遥远,寒暑假我都留校,没有回家。刚入学的头一个学年的寒暑假,成天玩,白白地浪费光阴。进入中师二年级时,音乐老师在课堂教了怎样拉二胡。记得就在第二个学年的寒假,我用罐头筒做琴筒制作了一把土二胡,就这样正儿八经地学拉起来。我们音乐老师叫敖克成,当时同学们习惯称他为敖先生。敖先生对同学特别

好,只要你肯学,他就耐心教。在敖先生的指导下,我终于在那个假期跨入了二胡之门。从那以后,为了拉好二胡,我除上课的时间外,几乎所有课余时间都在学识谱、学音乐基本知识,甚至狂妄地学起作曲来。1958年师范毕业后,我在惠水县任中小学教员期间,开始了歌曲创作。1959年发表了处女作《歌唱贵州的山》(作曲),哪知道这首歌竟被选进当时省编的中学音乐课本;后来发表的《歌唱苗岭山》(词曲),又被团省委选进向全省青年推荐的《青年歌曲选》,竟然与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从此,我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

接触侗族文艺,那是1962年10月我从教育部门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才开始的。虽然说时间不算长,但到今年也进入第36个年头了,人生又有几个36呢?

对于侗族文艺,我从接触到学习,从学习到热爱,从热爱到继承,从继承到创新,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假如当年我不调回家乡,仍在惠水县工作,那里是布依族地区,尽管我爱好文艺,也绝不可能去搞侗族文艺的创作和研究;假如我回家乡后,组织上没调我到县文化馆,仍从事教育工作,我也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侗族文艺的创作和研究。榕江是一个多民族的县份,少数民族人口占75%以上(当年的人口比例),侗族又是全县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时县文化馆没有侗族干部,因此组织上把我调到文化馆,为我从事侗族文艺创作和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下面谈谈我从事侗族文艺创作、研究的感受和体会。

对于民族文化,我始终遵循这样一个逻辑:要想了解它的现在,必须先了解它的过去;只有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才能更好地预示它的将来。

我从事侗族文艺创作和研究,条件是组织上创造的,路是侗族民间的歌师、戏师、说唱艺人们引的。我常对人说:“我的老师在民间。”我这样说,并不是把我读小学、中学、师范时的老师都忘记了,也不是把本单位的领导和周围的同志忘记了,我是说在侗族文艺方面引我上路的,确确实实是侗族民间艺人。

我们侗族也和全国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历史上没有文字,所以它的民族文艺基本上靠民间艺人口头传承。侗家有句俗话:“客家有书记古典,侗家无文靠口传。”我调到县文化馆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侗族民间,搞调查研究,真心实意地向民间艺人学习,拜民间艺人为师。我的家乡三宝侗寨有一个著名的侗族歌师,名叫杨成林,他不但掌握很多传统的侗歌侗戏,而且对侗族文艺很有研究。60年代初,我上门找他,拜师求艺。通过接触,他看到我诚心诚意学习侗

族文艺,就毫无保留地教我,并把他几十年来精心搜集的借用汉字记侗音的歌本、剧本拿给我看,教我认,随我抄。老先生还教我怎样编侗歌,怎样掌握侗歌的音韵。在他老人家的耐心指导下,我步入侗族文艺之门。我会拉二胡,会拉小提琴,但不会弹侗族琵琶,不会拉侗族果吉(牛腿琴)。为此,我拜年轻的乐手们为师,跟他们交朋友,深入歌堂向民间乐手学习,很快就掌握了侗族琵琶和侗族果吉的演奏方法。因为我会拉二胡和小提琴,在演奏本民族乐器时,我就借鉴了二胡和小提琴的一些演奏方法,乐手们还说我演奏比他们还高级一些。侗族居住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地区,我向民间学习,不局限在本省本县,还经常走出去向外县和外省的侗族民间艺人学习。我向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著名侗族老歌师吴居敬学习侗歌,向从江县著名侗族戏师梁普安学习侗戏,向小黄老年妇女说唱组萨凤姣等学习侗族多声说唱,向黎平腊洞的侗族戏师杨胜高学习侗戏《梅良玉》,向四寨著名侗族说唱艺人潘老替学习果吉拉唱,向本县的侗族歌师固利、甫兰等学习琵琶弹唱。由于我与三省区侗族民间艺人广交朋友,因此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知识,促进了自己的创作和研究。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旺贵在侗族曲艺交流研究会上称赞我是侗族“当代岁耶”(“岁耶”是侗族传说中挑歌传四乡的歌仙)。后来《黔东南报》和《贵州日报》也发表了以《侗族当代岁耶》和《当代岁耶——普虹》为题的介绍文章。实际上我怎能与传说中的歌仙岁耶相比,岁耶为了给侗乡带来欢乐,吃自家的饭去传歌,不要群众分文报酬。而我呢?是国家工作人员,吃国家皇粮,拿国家俸禄,本来就应该做出一些成绩,做不出成绩还应该打屁股呢!所以,我比不上歌仙“岁耶”。

我在向民间艺人学习的实践中体会到,学习者一定要尊重民间艺人的劳动,不能将他人的成果占为己有。有的人认为,民间文艺流传于民间不是哪一个人的,整理出的作品连口述者的名字都不标,只标自己的名字。也有的人把民间艺人自己整理的材料,只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动,标名时,只承认艺人是口述者,而自己却成了搜集整理者;有的虽然把两个名字并列,但把自己的名字排在艺人之前。这些都是不尊重艺人劳动的表现,严重地伤害了艺人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碰到这些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我的民间老师、侗族著名歌师杨成林,1980年临终前,嘱咐他的子女,在他死后把他所搜集、创作的侗族文艺手稿,转交给我保存和使用。1984年,我州要在黎平举办首届侗戏调演,为了不辜负杨老先生生前对我的信任,于是我将他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作的侗戏《丁郎

龙女》进行整理改编，搬上舞台。杨老先生的原稿是按传统侗戏的编创手法编写的，不进行较大的改编，怎能登上现代舞台？为此，我先对原稿进行整理，然后进行慎重改编。改编的剧本演出后，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应选参加全省首届少数民族戏曲观摩汇报演出和全国在昆明举办的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录像（演出）暨座谈会，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剧目演出奖。剧本打响后，很多人向我祝贺，问我这个剧本编剧是谁？我不论在哪种场合都说，《丁郎龙女》编剧是已故侗族戏师杨成林，我只做了一些整理改编的工作。剧本发表时，署名仍是杨成林的编剧。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曲六乙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多种场合赞扬我的为人。我个人认为，我只能这样做，才对得起九泉之下的老师。还有一位是我的兄长和同学、瑞里小学的杨胜贵老师，我刚接触侗族文艺时碰到的许多难题都是他帮我解答的。有一次他给我寄来一大沓《侗族酒歌》的整理稿，要求我修改后加上我的名字再投递出去。对他的稿子我认真进行再整理，花的心血也不小，但我没有加上自己的名字。当他收到刊物编辑部给他寄去的书和稿费时，给我来信说：“你不加名字，我太过意不去了。”后来见面时，我才对他说：“我是文化馆工作人员，扶植业余作者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另外一位是赧勇小学的民办老师（现已转为公办），名叫杨波。杨波老师爱编侗族少儿歌曲，但不识谱，无法按自己唱的记录下来，在学校教学生唱仍袭用民间“口耳相传”的方法。有一次他到县里开先进教师会，我问他最近编有什么新歌？他说“你坐下来我唱给你听！”我立即掏出笔记本，连谱带词一起记下来，整理后标上“杨波词曲”字样寄给贵阳市的《新花乐刊》。采用后，书和稿费寄到学校，同学们都高兴地跳起来，“杨老师的歌上书了”的欢呼声响彻整个校园。由于我能正确对待民间艺人和业余作者，所以无论是在省、州文艺界或是在侗族民间，我的声望是好的。一些熟悉的朋友说我“失去的少，而得到的多”。确实，我失去的是名字落前落后或不落名字，而我得到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信任。

我还想讲一点，如果一个人有机会主持一个部门的工作，就应该做几件给后人留下脚印的事情。因为我在1982年至1987年，任过整整五年文化馆馆长。在我的任期内，有几件事是值得回顾的。

第一件，我刚接任馆长时，为了摸清全县群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以便制定对策。1983年春夏之交，组织全县文化馆、文化站职工，利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全县性的民族文化普查。既摸清了情况，又锻炼了干部。那次普查，受到省州文化主管部门的肯定，《普查情况汇报》一文被州群众艺术馆办的刊物

《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登载,向全州推荐。

第二件,侗戏是侗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发展很缓慢,与先进的戏曲剧种比差距很大。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侗戏艺术,从1984年起,文化馆把侗戏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戏剧改革,剧本是关键,人们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在进行侗戏改革时,首先抓剧本的创作,当年将已故戏师杨成林创作的侗戏《丁郎龙女》进行改编,第二步抓音乐唱腔的设计,第三步抓表导演的提高,第四步抓丰富乐队伴奏。当年《丁郎龙女》一剧先参加黔东南州首届侗戏调演,接着选送参加全省少数民族戏曲观摩演出和全国在昆明举行的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录像(演出)暨座谈会,荣获创作奖和演出奖;接着在湘黔桂毗邻的侗乡各县巡回演出,既得到专家的肯定,又受到侗乡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继《丁郎龙女》之后,我们又创作和改编了《芒岁流美》、《抢秀才》、《甫桃》、《上学路上》等剧目,推动了全县侗戏改革工作。

第三件,选编侗族少儿歌曲《长大要当好歌手》,供侗乡中小学作音乐课补充教材,把民族音乐引进学校,深入课堂。《歌选》1985年内部铅印后,我县先后办了两期民族音乐师资培训班,推广到侗乡中小学,普遍受到学生欢迎,家长也很满意。在我县的影响下,从江高增小学、小黄小学、黎平岩洞小学和锦屏秀洞小学,也都将民族音乐引进课堂,收到同样的效果。湖南怀化地区群众艺术馆侗族音乐家吴宗泽来信称赞:“你们编的歌本很好,搜集了侗族少儿歌曲的精华。”全国《儿童音乐》杂志主编、我国著名儿童音乐家张文纲也来信说:“侗族少儿歌曲选《长大要当好歌手》我看了,感到很兴奋,我们的兄弟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小学音乐补充教材。歌选里的少儿歌曲侗族民歌风格非常鲜明,真是爱不释手。”

第四件,为了培养侗族文艺的接班人,我们在车民小学建立“金蝉侗族少儿艺术团”,以演唱侗族少儿歌曲和其他优秀侗族民歌为己任。几年来,他们参加过全国性的、侗族四省区的、全省性的、全州性的文艺会演或专项比赛,均获得较好的名次。1988年,“金蝉”一名小歌手参加中国少儿艺术团赴法国交流演出,她们演唱的侗族少儿歌曲,受到国外少年儿童的欢迎。同年,有两名小歌手破格录取省艺校侗歌专业班。

第五件,1985年冬,牵头召开全国性的侗族曲艺交流研究会。北京、长沙、贵阳、南宁和湘黔桂三省侗族县的专家学者、侗族民间说唱艺人欢聚榕江,交流

和研究侗族曲艺,对侗族曲艺的确立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会后,将会议资料汇编成《侗族有曲艺》一书,上报下发,扩大会议影响。

1987年下半年,我主动辞去馆长职务。1988年初,文化馆为方便我的工作,增设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室。十年来,我参与《侗族文学史》、《侗族通览》的编写,单独出版了《侗族音乐史》、《侗族曲艺音乐》,合作出版了《贵州侗戏》、《中国侗族戏曲音乐》、《苗族始祖的传说》等书籍,牵头召开了跨省区的侗族“萨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跨县的“黎榕从三县民族曲艺座谈会”。

30多年来,我在群众文化战线上“跑龙套”,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距离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还很远。我的决心是:愿做山乡画眉鸟,永远为山乡人民歌唱,为社会主义歌唱。

(此文是作者1991年参加黔东南州“奉献者之歌”报告团的发言稿,后修改辑入《侗族百年实录》一书)